

認識自己，是一個人一生的修行

——從徐希峯老師的人生談文化、藝術與自由精神



在當代公共語境中，“認識自己”常被理解為一種心理層面的自我認知，或成功學意義上的自我定位。

但在徐希峯老師於悉尼詩詞協會舉辦的文化論壇長達數小時的演講中，這句話被賦予了更為厚重、也更為艱難的內涵——它不是自戀，不是自我包裝，而是一種在歷史擠壓、現實不公與個人命運反復跌宕中，仍然保持清醒、自知與尊嚴的能力。

1. 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也不要把別人不當人

徐希峯反復強調的一句話是：“你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也別把別人不當人。”這並非處世圓滑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種深刻的人文判斷。

在她看來，許多歷史悲劇與現實荒謬，都源於“德不配位”：把自己看得過高，把他人看得過低。這種失衡，既體現在政治權力中，也體現在文化與學術領域中。一旦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失去對他人的尊重，所謂理想、信念、事業，便極易走向專斷與暴力。

這種反思並非空洞道德訓誡，而

是與中國思想傳統緊密相連。徐希峯特別提到墨子及其“兼愛”“非攻”的思想。在她看來，墨家所代表的平等博愛精神，是中國思想史中極其珍貴、卻長期被邊緣化的一支。它所蘊含的社會理想，對任何等級森嚴、權力集中的結構而言，都是一種威脅，因此在歷史上屢遭冷落。

由此，她將“認識自己”提升為一種倫理自覺：承認自身的有限，尊重他人的完整。這種精神，既是個體修為，也是社會健康的基礎。

2. 文化不能自戀，傳統需要被重新理解

徐希峯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並非簡單的禮贊。她高度肯定古詩詞、傳統戲曲的藝術價值，認為其中蘊含著高度純粹的審美經驗與精神力量；但同時，她也警惕一種“文化自戀”。

她用中國水墨作比：墨色雖精妙，但若沉溺於“唯我獨尊”的自足之中，便會錯失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文化真正的生命力，不在於封閉守成，而在於不斷吸收、轉化、重生。

這一判斷，與她自身的藝術經歷密切相關。話劇作為“舶來品”，使她得以在極為特殊的年代接觸到莎士比亞、易卜生、果戈裡等西方經典；而中國傳統戲曲與現代文學，又為她提供了另一種精神滋養。正是在這種“雜糅”“亂燉”中，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視野。

在她看來，所謂“亂燉”，並非雜亂無章，而是一種在歷史夾縫中求生的文化狀態。被迫走多條路，反而獲得了更廣闊的世界。

3. 底層經驗：藝術不是想像出來的

徐希峯反復強調，真正支撐她藝術生命的，不是技巧，而是底層生活經驗。

她少年時期輾轉於掃院、拉車、

刷漆、下工廠、插隊、下放林場，在饑餓、羞辱與不確定中成長。這些經歷，使她對“苦難”沒有浪漫化的想像，對“奮鬥”也沒有虛假的激情。

正是這些經驗，使她在舞臺上理解人物，在寫作中理解人性。她坦言，若沒有這些生活的錘煉，後來對戲劇人物的把握，不可能由淺入深。藝術不是憑空創造的靈感，而是生命體驗的沉澱。

因此，她並不認同“躺平”的態度。不是因為否認現實困境，而是因為她相信：當一條路走不通時，仍然可以在有限的選擇中，把手中的事做到最好。活下來，活出尊嚴，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4. 寫作的困境與創作的堅持

在演講中，徐希峯坦率地談到創作過程中的挫敗：劇本被否決、題材被禁止、成果被掠奪、名字被抹去。她並不迴避制度性限制與現實不公，也不將失敗簡單歸因於個人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她始終拒絕放棄創作本身。無論是戲劇、小說、影視，還是後來轉向繪畫，她始終在尋找表達的出口。

繪畫，對她而言並非逃避，而是一種“轉身”。當文字無法承載內心重量時，她借助水墨的自由，重新安放精神。她在自序中寫道：“我欣慰我的作品已然有了一點點我自己：不做作，散淡，靈動，大氣，自由。”這並非藝術宣言，而是人格立場。

5. 老年寫作：不是回憶，而是清算與告白

八十歲寫下《風塵芻狗》，並非遲暮之作，而是一種遲到的勇氣。徐希峯明確指出，她此前的大量寫作多為“遵命之作”，未曾真正書寫自己與家族的命運。

在生命的下半場，她選擇直面歷史，直面個人經驗，不再迴避那

些“不該忘卻的紀念”。這種寫作，不是為了文學潮流，也不是為了成功，而是一種對自身人生的交代。

她深知自己已遠離當下主流，但正因如此，反而獲得了自由。不再取悅、不再迎合，唯有誠實。

6. 作為“遊戲者”的人生觀

在演講中，徐希峯將自己定義為“遊戲者”。這並非輕佻，而是莊子意義上的自由精神。

在她看來，人生最大的誤區，在於過度執著於功業、結果與評價。真正的幸福，是能夠按照內心的秩序生活，在不同階段允許自己重新開始。藝術如此，人生亦然。

“認識自己”，並不是固守自我，而是在變化中保持清醒；不是戰勝世界，而是與天地精神往來。

在這個意義上，徐希峯在悉尼詩詞協會的演講並非個人回憶，而是一份沉重卻清醒的思想文本。它提醒我們：在歷史洪流與現實壓力中，人仍然可以通過自知、自守與自由，保住生命的尊嚴。

尹鋒



徐希峯老師創作的長篇小說《風塵芻狗》



徐希峯中國畫作品《報春圖》



徐希峯老師在悉尼詩詞協會舉辦的文化論壇上演講。

（編者按：郭存孝先生曾任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館長等職。作為國際文化交流領域活躍的學者，其學術成果涵蓋太平天國史研究、名人信箋彙編及中澳文化交流史等領域。郭老現居墨爾本，已經高齡九十七歲，還筆耕不輟，令人敬佩。）

胡適（1891-1962）博士乃中國著名的大學者。他的足跡遍佈美、歐、亞洲諸國；他的朋友滿天下。但是他沒有去過大洋洲和非洲。就以大洋洲而論，他沒有到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但是他從年輕時候起，便擁有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良友，這當中，不單有學者和平民，而且他還以擁有紐西蘭工黨政府總理朋友為樂事；並且相互還是通信之知音，這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

當然，中國派駐紐西蘭的外交官，並非始自胡適時代，而是早在清末民初便開始了，那年是始自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到宣統三年四月（1908.5-1911.5）。首任領事官為黃榮良，依次是夏廷獻、周璽。三位皆是出身翻譯官。其中要以黃榮良較有名

氣，1911年5月調任駐澳大利亞總領事，最後官拜中國駐奧地利公使。民國三年至六年（1914-1917），派滿族人桂植為領事。民國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派遣林軾垣為領事。云云。

其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胡適的高深學識早有所聞，因為澳大利亞各州的高等學府甚多，故而頻頻發出邀請前來講學。紐西蘭雖然沒有大鄰國那麼闊綽，但出於相同原因，她也抱有同樣目的。兩國無可厚非，結果都很失望！不過，胡適早在年輕時，1912年10月，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文學院讀書時，他便“與紐西蘭人A.M.西一Taggart君為友，同出散步，日朗氣清，天無纖雲，真佳日也”。1938年3月，胡適在美國西雅圖市，曾接待因慕名而來的紐西蘭斯特拉夫夫婦，並與之親切交談。是年8月，胡適在法國巴黎卡塞姆飯店飲茶時，喜見紐西蘭菲希爾教授夫婦，雙方做了空前的交流，等等。

1858年4月，胡適在臺灣已身居中央研究院院長之高位，公務日煩，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日隆。1859年

胡適珍愛紐西蘭

4月19日，臺灣外交部長黃少穀來談澳洲外交部來電，邀請（胡適）先生講學的事情。黃少穀走後。先生對（秘書）胡頌平說：“澳洲有整個大陸那麼大，人口只有臺灣那麼多，三分之一是沙漠，城市都在沿海一帶。那邊國立大學之外，還有四個大學。我每次經過日本，日本的邀請演講，我都沒有答允。朝鮮也沒有答允。而且澳洲附近的新錫蘭（即今紐西蘭），那邊也有許多朋友，如果去澳洲，那末，新錫蘭、日本、朝鮮這三個地方就沒有理由不答允了。所以我還在考慮之中。”由此可見，胡適是自有難處，並無誰家可去誰家不可去的等級選擇的。

1960年11月10日晚七時，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邀請來台訪問的紐西蘭大學校長史密斯與重要陪客胡適院長共進晚餐，主客交談甚歡。

胡適出席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會議後，回到臺北不久便因病住院了，在這

期間，1960年12月7日，他“接到紐西蘭首相納蘇（Walter Nash）的一封信，很感興趣。”他對秘書說：“納蘇今年七十八歲了，最近紐西蘭選舉，他的勞工黨失敗了。他也快要下來了。我在三十年前就知道納蘇是個未來的勞工黨的領袖。這個人的樣子很難看，很粗，但替紐西蘭做了不少的事。在勞工黨執政二十年中，每個孩子出生後，孩子的母親就可得到每月三元五角的補助，年齡大了，還有增加，一直補助到十六歲為止。如果讀書的孩子，可以補助到十八歲。紐西蘭碼頭工人的薪水比大學教授都高。美國也是如此。”

1961年6月6日。駐澳大利亞大使陳之邁曾在紐西蘭會見已下臺的工黨政府前總理納蘇，談過兩次話。納蘇對陳之邁說：“他對胡（適）先生最欽佩的。納蘇曾一再的托他向胡（適）先生問候。”胡適聽罷也很感動！連忙說道：“納蘇近八

十歲了，耳聰目明，非常健談，對世事極為留心，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關於納蘇前總理在位時如此關注社會福利，這已是有口皆碑的事了。紐西蘭當代學者趙曉寰、喬雪瑛對國家領導人的福利觀，也已有公論了。他們說道：“紐西蘭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福利制度的國家。”他們更是將這個最得人心的福利制度的優勢具體化。說道：“社會福利制度的目的，在於讓廣大的紐西蘭人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遇到失業傷殘等不幸，仍能靠福利渡過難關，

使生活有保障。1938年的工黨政府通過了“1938年社會保障法案，”從而建立了全面的社會福利政策。……在於使紐西蘭人重新成為獨立自強的人。”

愚意認為當年工黨競選雖失敗，但她竭力提倡的福利政策的觀念和取得的效果，早已深入人心。中國著名大學者胡適稱讚他的好友納蘇這位前總理是一位紐西蘭的“了不起的人”，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金言啊！

（2025年12月於墨爾本。）

郭存孝



郭存孝（前右）周文傑（後中）伉儷和悉尼文友攝於墨爾本（2014年8月10日）